

董必武的勤俭观：“民生在勤，性习于俭”

每天早起后，他泡上一杯普通的西湖龙井，一天之内只能续水、不加茶叶。他爱用牙签，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，总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，直到用烂为止。

“民生在勤，勤则不匮。性习于俭，俭以养廉。”这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董必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下的座右铭。他以此自勉自励，也严格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坚持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。

1945年，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。作为代表团成

员之一，董必武有一笔可观的置装费和生活费，但他不仅手过千金分文不沾，而且还“克扣”自己的费用，在个人生活上精打细算，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党和人民的事业。当时发给他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，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，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，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，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，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。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，不住豪华宾馆，从不到大餐馆用

餐，还经常自己做饭，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，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《新华日报》急需的印刷机、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《解放前实录》等，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曾任政务院副总理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、代主席等领导职务，但地位越高、荣誉越大，董必武越戒奢从俭，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，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。用纸方面也如此，董必武自己

说：“我在用纸上是最富的，也是最穷的”。他常写东西，所以用纸多，是富有的；可是他一张小纸片也舍不得浪费，很多作品都是写在旧台历纸、晚会节目单、废旧请柬上的，而且正反面都写上字，所以自嘲是最“穷”的。

平时生活中，董必武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，他对子女们说：要你们用钱记账，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，而是要胸中有数。这样做，养成习惯，将来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，要用钱的时候，就会从实际出发。 《学习时报》2017.5.8 文/王达阳

1935年12月24日，胡适收到了周作人的新年贺信。次日晚，胡适写了一首贺新年的诗回复，以示同贺新年之意。诗云：
可怜王小二，也要过新年。开口都成罪，抬头没有天。
强梁还不死，委曲怎能全。羨煞知堂老，关门尚学仙。

胡适为何自嘲“王小二过年”

王小二过年——一年不如一年，说的虽然是个人境遇，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时局状况。王小二是时代的小人物，却可以因为偶然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，而因之出现“一年不如一年”或“一年胜似一年”的巨大生活差异。以“王小二”自况的胡适，也自然有当时的困境与苦衷。

原来，自1932年创办《独立评论》杂志以来，胡适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与政治理解，积极参与抨击时政、人权启蒙的工作，先后在杂志中撰写了1309篇文章。这本中国现代政论杂志，前两年的经费完全由独立评论社社员自行集资，不但经费筹措要担经济风险，还有“因言获罪”的政治风险。胡适在杂志中倡行的自由主义精神，在中国时局之下，实际上也是两头不讨好的特立独行，“一年不如一年”的困境在所难免。

以胡适为首的一帮新派知识分子，自掏腰包去自谈国事，在周作人看来，这就是“不务正业”，以荒废自己的学术生涯为代价去冒险，得不偿失。事实上，胡适的半部“哲学史”、半部“白话文学史”等一系列尚未完稿的学术著述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投身政治运动之后所无法弥补的缺憾。另一方面，周作人怡然自得的书斋生活，在胡适看来也是“学仙”式的自娱自乐，这种生活隔绝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自由精神，也完全抛弃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普世情怀，并不值得倡导。

当然，胡适认定的自由主义精神与政治变革之路，是不会因为这些学术上的缺憾和友人的背离而却步的。所以才有了“可怜王小二，也要过新年”的自嘲兼自勉之句。事实是只过了一年，《独立评论》杂志在1936年底因造论反对日本策划“华北政权特殊化”，一度被迫停刊。“开口都成罪，抬头没有天”之句也因之应验，胡适对此或已早有预见。但“强梁还不死，委曲怎能全”，在胡适的百般斡旋之下，杂志又于1937年4月复刊，虽然旋即又因“七七事变”而被迫停刊。

事实上，在贺年诗中自嘲的胡适，1935年末最后这几天一直过得不顺，心情极度焦虑。这期间，有好友丁文江的病重，有北大学生停课请愿，有个人财务上的亏空等等；最为重要的是，他努力参与的评论时政活动始几乎处处碰壁。种种窘状，看来此刻的胡适，的确没有什么迎接新年的好心情了，还真有点“王小二过年”的情状了。

《北京青年报》

张乐平笔下纯真无邪的儿童世界



张乐平笔下的“三毛”形象，几乎影响了几代儿童。三根卷卷的毛、圆圆的眼睛、翘翘的鼻头，乐观幽默、聪明机灵的性格，“三毛”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。其实，张乐平先生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儿童题材作品，涉及了漫画、连环画、中国画、素描等，构思新奇、形象细腻，再现了天真烂漫的儿童心理世界。

张乐平的作品《骑马》描绘了两个孩童拿长板凳当马儿骑的场景，长凳前头装个马儿的面具，后头有小狗在追逐，两个孩童笑的睁不开眼。画上的配字“马儿满地跑，跑过三座山，跑到哪里啦；马儿满地跑，跑过八座桥，还在屋檐下”，再现了孩提时代自娱自乐的场景，童趣十足。

张乐平之子张慰军认为，天真烂漫的题材永远不会过时，而其父亲正是有着一颗童心，他说：“我父亲也是很喜欢和大家在一起的，在做儿童题材的时候，经常和孩子在一起。有时候还带上我，到学校、幼儿园、少年宫去。”

张乐平创作的“小茉莉”形象，与“三毛”正相反，《小茉莉》可谓是张乐平“小资”风格作品的代表作。张乐平先生笔下的童趣世界中，除了经典的“三毛”形象外，还有像小胖、小茉莉、小萝卜头等可爱的孩子。

除了孩子，张乐平先生也爱小动物，他笔下的小猫咪咪就是以家里的

宠物猫为灵感。小猫咪咪爱吃鱼，为了抓住鱼缸里的小金鱼，她不惜跳到鱼缸里，却弄巧成拙，头被鱼缸卡住了，金鱼逃了出来。咪咪原本兴奋的眼神里充满了沮丧，呆呆的望着金鱼，楚楚可怜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。

张慰军说：“特别是他小时候在农村的那段时间，对这些动物也有很细致的观察，所以他在小猫咪咪的作品里体现出来，把他描绘出来。”

上海市嘉定区秦古美术馆馆长陶贵祥认为：“我们大人看了都会想起来童年的记忆。张乐平先生的作品有些以国画形式，有些以素描的形式，从绘画风格上面来说还是多样化的，也体现了一代大师的风范。”

作为杰出的漫画家，张乐平先生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捕捉饶有兴味小事，他笔下的世界生动有趣、活泼灵动，人物性格更友善友爱。

澎湃新闻 2017.6.1

名人高考偏科的那些奇葩事

1917年，一位考生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。胡适阅卷时兴奋地说：“我看了一篇作文，给了满分，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。”可校委们查看这位考生的成绩单，数学成绩是零分，其他各科也平平。取弃之际，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，破格录取他。11年后，他31岁执掌清华大学。他就是罗家伦。

巧得很，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次年招生考试时，一名考生国文和英文考得非常好，只是数学成绩不及格。他亲

自把这位考生叫到校长室谈话，之后特准其入学。这位考生就是钱钟书。

1930年，国立青岛大学招生考试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：一是《你为什么报考青岛大学》；一是《杂感》。两题任选一道，一位考生把两题都做了。其中第二篇文章只有3句话，闻一多咏诵再三拍案叫绝，破例给了他98分的高分。那年他的数学考了零分，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。他就是著名诗人臧克家。

1930年他报考北大时，国文、英

文得了满分，数学考了零分，北大不予录取。他不甘心，又转考清华大学，结果国文、英文又考了100分，数学依然是零分。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，毅然决定破格录取。他果然不负众望，后成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、明史专家。他就是吴晗。

钱文忠教授在撰写《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》时，知道季老小时候学习严重偏科。他先是问季老本人当年高考时数学考了多少，季老只说“很低的”，其他并不多言。钱文忠查了清华大学的档案，发现季老数学只考了4分，且他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。

《人民政协报》

“科技控”李鸿章：做事爱沾个洋气

李鸿章的个人爱好是对“新玩意”极其感兴趣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“科技迷”。如果有心之人对他的奏折稍加整理，那就是一篇科技论文。李鸿章曾写过一份“蒸汽动力运转奏折”：“辘木、打眼、绞螺旋、铸弹诸机器，皆绾于汽炉，中盛水而下炽炭，水沸气满，开窍由铜喉达人气筒，筒中络一铁柱，随气升降俯仰，拔动铁轮，轮绾皮带，系绕轴心，彼此连缀，轮转则带旋，带旋则机动，仅资人力以发纵，不靠人力之运动。”在那个“科盲”时代，这样的“科普”奏折算是凤毛麟角了。

李鸿章的这个爱好，为他赢得不少“实利”。当时朝廷因为知道他“识货”、“懂行”，很多公务采购大单都让他经手办理。据说他在天津的住处周围就像一个喧闹的万国商会，各色人等都来推销：德国的炮、英国的船、美国的西洋参、荷兰的船运等

等。如果真像某些人说的，他的财产等于现在的10亿人民币。

李鸿章爱好“科技产品”的故事一箩筐，如某年某月李到英国，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看呆了，李老不惜重金，给老太后购回一台。某年某月李老坐到刚发明的X光机上拍了张照片，成了中国第一个使用X光设备的人。

李鸿章的这个“科技迷”特质又引出了他的另外一个特征：爱沾个洋气。

晚清时代，皇家贵族爱沾个仙气，大臣清流们爱沾个清气，李鸿章做事儿爱沾个洋气。《李鸿章家族》里说：（毕德格）“还为他（李鸿章）用中文朗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、法文和德文的书籍，使李鸿章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，都不再生疏。很难设想，当时中国还有哪一位高官像李鸿章这样，用这样的方式读了如此丰富的外国书籍！”

最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办西医院：

1878年的冬天，他的夫人突发病症，郎中说是中风，外邪入侵导致半身不遂。吃了不知多少服药，然病就是不见好。无奈之下，李鸿章让英国传教士马根济博士来府一试。6天中，马根济大夫采用了“手摇电机诊治法”，终于挽回了李夫人的性命。

李鸿章从此开始相信西医，由兴趣竟引申出了一个想法——能不能在天津建一所西医医院？他开始做天津的官僚士绅工作，甚至安排了一场由马大夫操刀的“手术秀”。当一个比拳头还大的颈部肿瘤被马大夫顺利摘除时，官绅们都啧啧称奇。在李的积极倡导下，社会人士募集了六千银两，再加上他亲自捐赠的四千两，共计一万两银子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十一月一日，新建医院正式落成，即后来的马大夫纪念医院。《天津通志》有这样的记录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规模完整的私立西医医院。 《环球人物》